

张宇

转型政治经济学

理论界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转型政治经济学

张 宇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政治经济学/张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06437 - 7

I. 转… II. 张… III.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452 号

-
- | | |
|-------|--|
| 书 名 | 转型政治经济学 |
| 著 者 | 张 宇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余 瑾 |
| 封面设计 | 惠 岩 |
| 版式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½ 字数 223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437 - 7 |
| 定 价 | 35.00 元 |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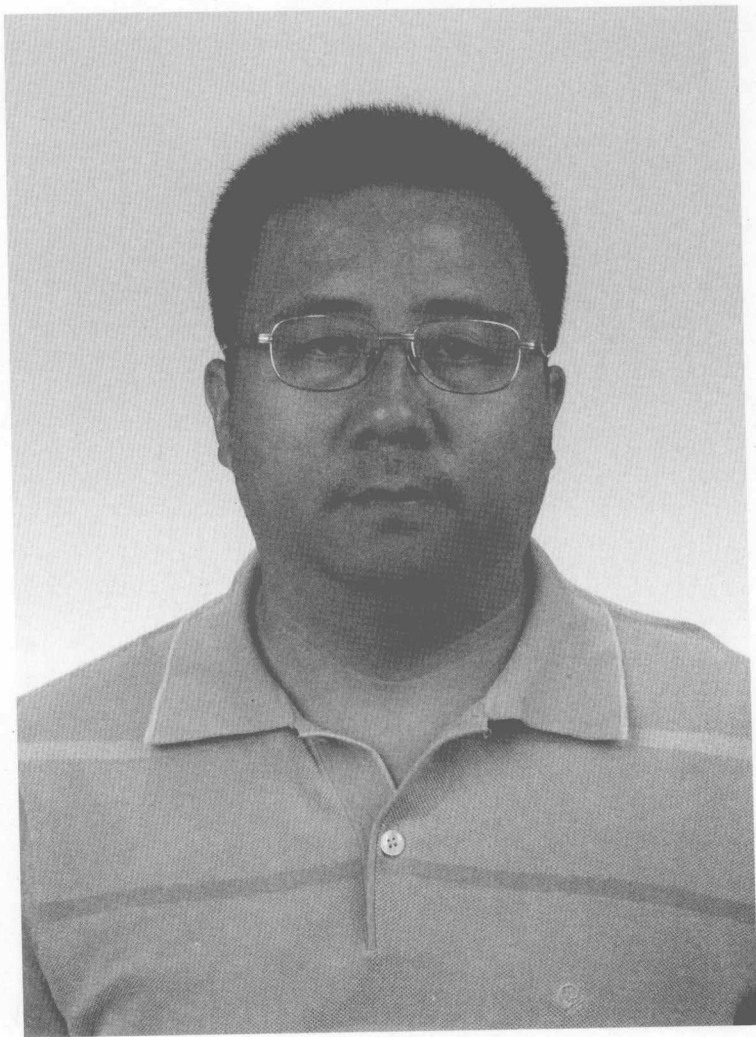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作者简介 | 张 宇

1964年生,陕西省榆林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学科首席专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市场社会主义反思》、《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等。曾主持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课题“制度变迁: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和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教育部重大课题的研究,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改革、过渡与转型	1
第二节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5
第三节 转型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12
第四节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49
第五节 本书的构想	68

第二章 制度、制度变迁与改革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制度结构	72
第二节 制度选择	89
第三节 制度理性	103

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结构

第一节 引言:关于市场经济的不同理念	112
第二节 资源配置与经济制度	114
第三节 分工、交换与生产	116
第四节 市场经济与所有制	118
第五节 价格与企业	122
第六节 自发秩序与社会调节	125
第七节 市场与国家	127
第八节 市场与道德	130
第九节 市场与民主	133

第十节 市场经济的层次性与整体性	135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139
第二节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44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151
第四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57
第五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的对立	163

第五章 中国的转型模式

第一节 转型模式的多样性	165
第二节 起点、目标与路径	168
第三节 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性质： 工业化 and 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的市场化	177
第四节 经济转型的基本问题与中国的经验	181
第五节 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	224
第六节 中国改革模式的实质和意义	230
第七节 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矛盾与持续条件	234

第六章 经济转型后期中国的改革模式

第一节 转型后期的阶段性特征	238
第二节 转型后期的主要矛盾和改革方向	240
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与新思路	244

参考文献	261
------------	-----

第一章 导 论

转型政治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是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的经济学学科,这一学科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条件^①。本章主要阐述转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流派和基本思路。

第一节 改革、过渡与转型

转型经济学的前身是所谓的改革经济学。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它有效集中和利用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并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收入分配的高度平等。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等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机制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虽然改革的内容各不相同,改革的步伐有快有慢,但都是围绕着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发展商品关系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展开的。主要的改革模式和改革思路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1. 改良的集权模式或完善计划经济的思路。这种思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在此前提下,承认社会主义生产

^① 对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在本书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界定,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稀缺资源配置的规律”是不同的,它研究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经济运动的规律。

也具有商品性的一面,承认价值规律的有限作用,主张利用价值、价格、利润等经济杠杆来刺激生产,实现计划的目标,至多在产品的品种、规格、费用结构等方面给予企业有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国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改革的,实行的是这种改良的集权模式。

2. 改革计划经济的思路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思路。在这种思路中,指令性计划被否定了,生产、分配和流通被纳入了市场调节的轨道,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企业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并没有被真正接受,整个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只局限在商品市场上,市场体系很不健全,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市场机制并没有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匈牙利、波兰都属于这种模式。

3. 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协调被否定了,但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调节也没有被真正接受,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企业之间的劳动联合和“社会契约”成为了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国家的集中决策和宏观调节相当微弱,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非常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南斯拉夫是这种模式的典型。

2 对于计划经济的改革到80年代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在改革步伐比较大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大增强,经济体制进入了新旧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阶段,“改革经济学”也在这一时期被明确提出,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果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一个时期的改革就是这种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过渡问题和过渡经济学的产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可以看作是同一个过程。但是,不能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经济体制

改革与 90 年代以后的经济过渡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的区别是以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为界限的。首先,在 90 年代以前,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中进行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为目标的)。而从 80 年代末开始,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苏联以及东欧开始被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逐步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革命”,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次,在 90 年代以前,改革虽然是市场取向的,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对于计划经济的调整和完善仍然是改革的主流。而在 90 年代以后,无论在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中国,市场经济都明确被确定为改革的基本目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了世界性课题。因此,过渡经济学作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有明确含义的经济学学科,是以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政治上的剧变和经济上全面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标志的。1989 年,在苏东剧变前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瓦奇(Kovacs)在一篇名为《改革经济学思路的演进与分类》的论文中,曾这样预言了改革经济学的灰暗命运,他说:

在东欧,新自由主义正在给改革思想掘墓,有人说,“你过去想构造一本跟得上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概念的分类学,现在你应该为改革思维作为一个总体写个讣告”。自由主义思维在东欧的再现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使“什么是改革经济学”和“如何比较不同的改革概念”之类的问题变得过时。^①

90 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了转型国家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进入了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市场体系

^① 周小川编译:《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 年。

的发育,隐性失业和隐性通货膨胀的显性化,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社会的不稳定状态,等等,这些问题都属于过渡问题。以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和规律为目标的经济学被称作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随着转轨问题和转轨经济学的出现,有相当一批经济学家投入了对转型过程的研究,这批研究者中包括了一些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布坎南、杰弗里·萨克斯、科尔奈等;有关转型问题的学术文献大量涌现;各种以转型经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也纷纷出现,如密歇根大学的威廉·戴维森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斯德哥尔摩转型经济学研究所(SITE),鲁汶天主教大学的 LICOS,爱丁堡黑里约瓦大学的经济研究和转型中心(CERY),布拉格的经济研究中心及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研究所(CERGE-EI),莫斯科的俄罗斯—欧洲经济政策中心和新经济学会,等等;出现了转型经济学的专门杂志(*Economics of Transition*);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项目和课程^①,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但是,随着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使用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这一术语并不能准确反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场深刻的社会变迁的特殊性质和丰富内涵。在早期的研究中,特别是90年代,转轨和转型往往是同一个英文单词 Transition 的不同译法,有时 Transition 也被译为“过渡”,但有时 Transformation 也被译为“转轨”,过渡、转轨和转型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大体上表达了同样的含义,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代替改革经济学,成为了说明经济改革规律和过程的主要理论。

进入新的世纪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Gregory C. Chow)在由美国 Blackwell Publishers 公司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探讨了转轨

^① 参见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Transition)和转型(Transformation)在研究对象和主题上的差别。该书明确地提出了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转轨经济学)和 Economics of Transformation(转型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二者共同的地方是都研究经济体制的变化;区别则在于转轨经济学传递的概念是经济处于一种向某种理想状态如特定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暂时状态;而转型经济学则并不包含一个众所周知的最后阶段的概念,它研究的是经济转型的过程,而没有一个关于最终状态的明确表述^①。邹至庄认为“转型”比“转轨”能更好地描述中国经济的变化,“转轨”是指改革过程将达到一种明确的和最终的状态;而中国的情况则是,经济体制将采取的最终形式仍然是未知的。2005年《比较》杂志第17辑刊登的科尔奈《大转型》一文,对于转轨与转型的差别作了说明:“转型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了许多方面,甚至是一些细小的转轨进程。有人把转型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这些转型有可能是同步推进的,也有可能是有前因后果的。”^②

转轨和转型的区分,绝对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且反映出学术界对经济转型过程认识的日益深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远远超出了所谓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化的狭隘视野,这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迁的整体的历史过程,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新奇性是用转轨或过渡一词所不能涵盖的。这样,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就逐步被转型经济学所取代。

第二节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时,在正统经济学

^① 参见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 科尔奈:《大转型》,载《比较》,第17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

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大力推广，一种被称为“休克疗法”或“大爆炸”的激进式改革方式被广泛采用了。一时间，过渡经济学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块试验地。虽然许多人预料到，实行这样的激进措施会造成经济的短期衰退，但是他们相信，少则几个月多则两三年的时间市场经济就会建立，经济发展就会走向繁荣。以上的共识是建立在关于转型的一些基本命题之上的：

(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能兼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了。

(2) 除非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否则体制的转型不可能成功。

(3) 除非私有产权制度得到了确立，否则企业不会对市场信号作出有效的反应。

(4) 除非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否则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不满意的结果。

(5) 除非彻底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否则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的抑制。

(6)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是快速的。

(7) 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①

以上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所谓的转型就是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它集中体现了七八十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全盘秉承了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②。上述命题不仅肯定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同时也强调了激进式改革相对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为什么激进式改革可以获得成功，而渐进式改革则可能半途而废？“大爆炸”理论的倡导

^① 参见 Ha-Joon Chang and Peter Nol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Macmillan Press, 1995, pp. 401-402.

^② “华盛顿共识”这一提法最早是由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总结出来的，这一概念得名于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财政部），这三大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其核心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者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1) 由于经济体制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因而，部分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

(2) 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求取消行政干预。

(3) 只有全面快速的改革才能使新制度的受益者在力量对比上超过旧制度的受益者，减少改革的阻力。

(4) 政府必须尽快控制通货膨胀以取信于民。

(5) 部分改革虽然能持续推进，但它会隐藏旧制度的残余成分。

(6) 新的“游戏规则”必须明确而迅速地建立起来，以避免混乱、人为的干扰和体制复归。

(7) 新政府必须充分利用大选后“蜜月期”，加快改革。^①

总之，从各个方面看，激进式改革更接近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的标准，也更符合正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般原理，而渐进式改革则充满了矛盾。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仅起步晚，而且起点低，既缺乏系统的理论，又缺乏足够的经验，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广度和彻底性。激进式改革强调理性的设计，而渐进式改革则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激进式改革是对传统体制的彻底否定，主张整体推进，一步到位，而渐进式改革则承认传统体制的历史合理性，实行分步推进，双轨过渡的战略；激进式改革明确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宪法制度，从经济的私有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入手全面向自由经济过渡，而渐进式改革则在市场化的过渡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改革目标。因此，激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渐进式改革的失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实际的结果却大大地出人意料，对于激进式改革的乐观预期很快就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被悲观的情绪所代替。一位波兰学者的观点很能代表这种情绪，他说：

^① Ian Jeffries, *Socialist Economics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Routledge Press, 1993.

东欧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了灾难。灾难一开始就以真正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形式表现出来,其破坏程度之强为当代历史所仅见。之后,这场灾难又表现为自毁自灭,几乎分文不取地将自己的大部分国有固定财产出让给外国人。^①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著名的转型经济学专家热若尔·罗兰概括地指出了转型的结果出人意料的几个主要事实: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显著增长,俄罗斯的黑手党现象严重;如此之多的国家分崩离析;最大的正面意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有这些出乎意料都表明经济学家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转型的结果,人们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②。虽然推崇激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理由来为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不良绩效进行辩护,比如改革的绩效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而与改革的政策和路径无关,宪政规则的彻底改变所造成的短期内的负面效应会带来长期的繁荣,等等。然而,正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讲求实际的经济学家们绝不会满足于百年的等待,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为4.9亿,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35%,而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8800万人,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下降到了7%左右。而在此期间,俄罗斯居民的平均寿命缩短了近10年,人口减少了近800万,至少有7000万人口陷入了贫困之中^③。1978—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8%,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跨过2万亿美元台阶,跃

①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② 参见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 参见谢尔盖·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

居世界第四位,人均 GDP 则由 1952 年的 119 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14 043 元(1 714 美元)。而在 1998 年,在历经了 9 年的痛苦的衰退之后,转型国家的平均加权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转轨之前的 67%。虽然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东欧各国和俄罗斯经济增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比如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保持 4—5% 的增长率(见表 1—1 和图 1—1),但是即便如此,俄罗斯到 2010 年才能恢复到 1990 年的国民经济的绝对值。也就是说,在运用了“休克疗法”进行转轨之后,俄罗斯的经济耽误了 20 年的时间,或者用 20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转轨之前的经济规模。

表 1—1 转轨国家 GDP 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单位:%)

国别 年份	中国	捷克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乌克兰
1988	11.3	2.0	3.3	-0.5	—	—
1989	4.1	4.5	3.8	-5.8	—	—
1990	3.8	-1.2	-7.2	-5.6	—	—
1991	9.2	-11.5	-7.0	-12.9	—	—
1992	14.2	-3.3	2.0	-8.8	—	—
1993	14.0	0.6	4.3	1.5	-8.7	-14.2
1994	13.1	3.2	5.2	3.9	-12.7	-22.9
1995	10.9	6.4	6.7	7.1	-4.1	-12.2
1996	10.0	4.2	6.2	3.9	-3.6	-10.0
1997	9.3	-0.7	7.1	-6.1	1.4	-3.0
1998	7.8	-0.8	5.0	-4.8	-5.3	-1.9
1999	7.6	1.3	4.5	-1.2	6.4	-0.2
2000	8.4	3.6	4.3	2.1	10.0	5.9
2001	8.3	2.5	1.2	5.7	5.1	9.2
2002	9.1	1.9	1.4	5.1	4.7	5.2
2003	10.0	3.6	3.9	5.2	7.3	9.6
2004	10.1	4.6	5.3	8.5	7.2	12.1
2005	10.4	6.5	3.6	4.1	6.4	2.7
2006	11.1	6.4	6.1	7.7	6.7	7.1
2007	11.5	5.6	6.6	6.3	7.0	6.7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2007 年数据为估算值。